

革命回忆录

(七)

人民出版社

革命回忆录

(七)

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75印张 132,000字
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00,001--23,000

书号11001·530 定价0.47元

《革命回忆录》丛书编辑例言

为了收集、积累、保存有关中共党史资料，以满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，特编辑革命回忆录丛书，分册陆续出版。

本丛书内容包括老党员、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的回忆录，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及革命斗争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，以及革命烈士的传略和纪念文章等，仅供参考。

《革命回忆录》上刊载的文章，力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尽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。但因一个人的革命实践有限，或因记忆有误，难免有不详尽之处。如有某些事实有误或有不同的见解，欢迎提出订正、补充。并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，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人民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鄂豫皖地区十年斗争概况	梅少卿 (1)
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的两年游击战争	刘华清 (34)
大别山区的三年游击战和高敬亭同志	李世安 余启龙 吴英诚 (55)
豫中合水镇战斗	陈右铭 (82)
“支部建在连上”	方 强 (92)
——在三军团做连队政治工作	
红七、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烈士事迹	吴西 林育 (99)
俞作豫烈士和他参加领导的龙州起义	覃尚文 (116)
我们所知道的周保中同志	王效明 王一知 (140)
东北抗联第十一军西征记	卢连峰 (159)
刘志丹同志指挥的最后一仗	裴周玉 (166)
东渡黄河,突破“天险”	刘 云 (176)
在毛主席身边一年	翟作军 (181)
奉命增援九军团,参加解放大上海	张云龙 (196)
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北撤	袁青山 (206)

鄂豫皖地区十年斗争概况

梅少卿

(一) 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

鄂豫皖边区位于湖北东部、河南的东南部和安徽的西部地区，南为长江，北为淮河。这片地区包括湖北东部的黄安（现称红安）、麻城、罗田、英山等地，河南的商城、新集（现称新县）和安徽的金寨、霍山等地。其中商城、金寨为大别山区的中心。这里山峦起伏，连绵不绝，交通极不便利，属于各省的偏僻山区。

一九二五年前后，大革命蓬勃兴起。北洋军阀为了抵抗北伐军的进攻，从北边抽调部队南援，这些军阀部队经过鄂豫皖边区，一路拉夫，抢掠，强奸妇女，烧房子，杀人，无恶不作。地主豪绅又借机强占土地，重重剥削，搞得民不聊生，妻离子散。生活在这兵连祸结、灾难深重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，就如积蓄已久的干柴，只要一点燃即可变成熊熊烈火。有些地方农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做牛做马的非人生活，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打富济贫的团体。只可惜由于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，没有革命思想的指导，均被地主反动武装给镇压了下去。

这就迫使一部分人出走，去寻找革命道路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，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，回来搞起了农民运动。

一九二六年到二七年春，党先后派了曹学楷、吴光洁、陈定候、徐朋人、周维炯、王秀松等同志，分别到湖北黄安、麻城，河南商城和皖西一带组织农会，开展农民运动。

我的家乡皖西金寨白水河一带的农会，是在一九二七年春成立的。这年二、三月，赵瑞祥、张玉洲等同志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，号召农民组织农会。第一次农会开大会，参加的人数约有两千余人，在会上他们说：广大农民深受封建势力、贪官污吏、北洋军阀的残酷剥削和压迫，要改变这种做牛做马的非人生活，就必须团结起来，与封建势力、贪官污吏、军阀进行斗争。此后，各地农会先后成立，广大农民纷纷参加农会。第二次农民大会是在梓树坪召开的，约有七千余人，这次主要是动员广大农民支持北伐战争，向豪绅地主要钱要粮支援北伐军，大会后各地农会都筹集了不少钱粮支援北伐军。

北伐军节节胜利，攻克武昌、汉口、九江等地，军阀部队溃不成军，散兵游勇流窜到山区来的很多。农民对这帮家伙恨之入骨，农会便组织农民用菜刀扁担等打击这群败兵，从他们手中缴获了枪支、子弹、马匹等物，这些武器武装了湖北黄安、麻城，河南商城和皖西一带的农会。武器虽然少，可给农民增添了力量。党又陆续从各地调来许多干部领导农民运动，这时是鄂豫皖农民运动的高潮，革命斗争形势很好。

但不久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，勒令解散城市纠察队，解散农村农会，并交出武器。当时

农会会员都想不通，虽然被迫交出了大部分武器，但也有个别人把枪埋藏了起来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，反动派首先在上海，然后在长沙、武汉、广州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。这种屠杀很快就蔓延到农村。鄂豫皖边区的许多农会干部被抓走杀害了，各地农会都不存在了，地主恶霸都跑了回来，组织了地主反动武装，到处抓人，逼农会会员还钱还粮，利用这些反动武装抢占土地，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。我们心中气愤万分，但又苦于手中没有武装，不知如何去干。

一九二七年七月，党决定给敌人以反击，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。

一、鄂东黄麻地区农民起义

南昌起义后，党派了一批起义部队的干部来到鄂东，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黄(安)麻(城)等地举行了农民起义。

一九二八年，黄麻起义部队遭受国民党部队的围攻，受到了一些挫折，保留下来的红色武装，学着井冈山的办法，决定在鄂豫边界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，并将起义队伍改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一师，由吴光洁同志任军长兼师长，戴克敏同志任党代表，汪奠川同志任参谋长，王秀松同志任鄂东特委书记。不久又建立了鄂豫边党政领导机关，徐朋人同志任鄂豫边特委书记，曹学楷同志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。

二、河南商城南部立夏节农民起义

一九二九年初，党为了扩大鄂豫边根据地的范围，决定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商城南部地区举行农民起义。经过多方

面准备,确定立夏节这天(五月五日晚上),在白水河、丁埠街、南溪街、汤家汇(双河)、斑竹园、李集等地同时举行起义。在丁埠街由周维炯同志领导,在斑竹园由肖方同志领导,在白水河由张玉洲、赵瑞祥同志领导。

丁埠街是个大集镇,驻有地主反动武装民团。周维炯同志已打入敌人内部做了许多工作,在士兵中发展了八个党员,加上在地方工作的五位同志共十三名党员,组成领导暴动的核心,里应外合地把这个民团给消灭了。斑竹园民团中也有农会打入的人员,也是里应外合搞掉的。而白水河的民团,全部是流氓地痞组成,内部没有我们打入的人,但在张玉洲、赵瑞祥的领导下,靠一条半枪(那半条枪无木枪托,且打不响)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,把这民团给消灭了。这一天晚上,在这几个地方共消灭了敌人七个民团,还抓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。在天亮之前,各路起义队伍汇集在太坪山附近,七路起义队伍建立了红三十二师,周维炯同志任师长,徐其虚同志任党代表。

三、皖西霍山农民起义

一九二九年冬天,我党又领导了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的农民起义。这支起义部队组建了红三十三师,师长是徐百川同志。政治部主任是姜镜堂同志。这一次农民起义后,鄂东、豫东南和皖西三省的红色区域联成一片,形成了鄂豫皖边区红色根据地。

四、成立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

有了这些红色武装,鄂豫皖地区就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。红军在党的领导下,贯彻党的方针政策,赢得广大人

民的拥护和支持，很多青年踊跃参军，部队发展很快，到了一九三〇年三月，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，军长为许继慎同志，副军长为徐向前同志。这时，中央成立鄂豫皖特委，书记由郭述申同志担任。

红一军成立之后，趁蒋、冯、阎军阀混战之机，大举出击，先后攻克霍山、英山、罗田、光山、罗山等县城及花园、杨家寨、信阳等车站，歼灭了敌人正规部队和零散的反动武装近万人，迅速扩大了队伍，全军发展到五千余人。李立三同志曾命令鄂豫皖边区红军配合友邻红军“夺取武汉”，并要在根据地实行一些“左”的政策。红一军没有实行打武汉的计划，而是利用良好的形势取得了更多的胜利。

六届三中全会后，党中央派曾中生同志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。曾中生同志来了之后，做了许多调查，发扬民主，集思广益，总结了由立三路线造成混乱局面的经验教训，制订了土地分配、发展生产、商业贸易、财政、粮食管理等各项建设根据地的政策。并且在纠正错误时只强调解决政策问题，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，把根据地的广大干部都团结了起来，因此这一时期根据地工作发展得很快，各级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，部队干部战士团结紧密，战斗士气很高，顺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一、二次“围剿”。

（二）斗争的胜利和挫折

一、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

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一年春，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

成濬设立了一个“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”，调集九个师的兵力，向边区进行“竹园式”包围，然后控制要路、重镇，最后进行分区“清剿”。

一九三〇年深秋，敌人就开始在根据地周围安设据点，逐步推进，向根据地进犯。我们部队根据敌人“围剿”的情况，决定趁敌兵力部署未完成之前，向南主动出击。十一月上旬，红一军猛攻姚家寨、黄安两地。敌军遭到我措手不及的打击，无法还手，立即仓惶退却。十一月下旬，消灭谢店东南还未立足的夏斗寅十三师的一个营另一个连，这时我部得悉新洲守敌比较薄弱，三十日夜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直奔新洲，迅速歼灭了郭如枝二十军的一个混成旅。这下何成濬慌了，忙调兵来堵击，我军已调头东去，早已攻下罗田，在那里又敲了他一棍，把何成濬的行动部署给打乱了。

十二月初，敌人调集兵力向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进攻，红一军这时已经转到皖西，特委决定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，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来扰乱敌人。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在敌后打击、破坏其运输线，摸岗哨，割电线，瓦解敌军。此时，蔡申熙同志领导的红十五军到黄梅、广济一带作战，从外线配合根据地的反“围剿”斗争，寻机与红一军里外夹攻敌人，粉碎敌人的进攻。

我红一军从罗田出发到皖西，出手歼灭范积熙六十四师所属的两个营及反动民团共千余人。继而又进攻麻埠、独山，一直逼到六安城下。敌人急忙调了一个旅增援，我红一军又回头向西在河南商城二道河附近击溃敌三十师一个旅，全歼一

个团，缴获山炮一门。敌人包围红军的企图宣告破产，局势从敌人进攻转向互相对峙。

二、成立红四军

一九三一年元月下旬，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会师，合编为红四军，军长为旷继勋同志，政委为余笃山同志。特委认为：敌人转为守势，我们要主动出击来调动敌人，消灭他们在运动之中；地方武装要配合歼灭敌人。红四军主力一部分围攻麻城磨角楼夏斗寅部队的一部，敌人立即派了四个团来增援，我部与敌激战三天，敌被我击溃，缴枪千余条，收复十几处集镇。二月间红四军又乘胜向京汉铁路柳林站发起攻击，歼灭袁英新编十二师一个营又两个连的兵力。敌旅长侯祥甫带了两个团增援，被我部队消灭在路上，侯祥甫也被我们活捉。不久，驻花园小河溪一带的岳维峻师向我军扑来，三月上旬到达双桥。我乘其还未扎根，在外围先歼灭其一个团。岳维峻急忙亲自带部队反扑，战斗打得十分激烈。我红四军主力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援助之下，包围了另两个团，打了一天，将其全部歼灭，抓了很多俘虏，连岳维峻也被活捉。在这段时间里我红军共歼敌一万三千多人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。

三、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斗争的胜利

一九三一年四月，敌人又急忙拼凑了一些部队，对我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“围剿”。我红四军采取避开其主力，在运动中打其弱点的作战方针，歼敌六千多人，使敌人集中的十五师、十四师、六十四师、六十五师、三十师、三十一师等十个师

对我军的“围剿”不能得逞。取得了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斗争的胜利。

经过两次反“围剿”斗争，根据地得到了发展，红四军也发展到二万多人，地方武装也扩大到一万多人，枪枝弹药得到了较好的补充。根据地的人口增加到一百八十多万人。土地革命日益深入，红色政权纷纷成立。

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需要大批干部，于是从部队抽调了一些人员参加地方工作。政府注意搞好少年先锋队、儿童团的工作，给部队输送优秀青年。另外，还创办了红军培养学校和“列宁小学”。红军培养学校主要招收革命青年，组织他们学习军事和文化，为红军培养后备力量。“列宁小学”是为根据地的少年儿童学文化而创办的。

在这期间，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很好，整个大别山区一片火红。

四、张国焘给鄂豫皖根据地带来的严重危害

一九三一年四月中旬，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后，推行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路线，后来又实行右倾逃跑主义，给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。

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后，根本不听曾中生同志的情况介绍，就指责鄂豫皖边区特委执行的是“非布尔塞维克路线”。五月十二日，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，分局设在河南新集（现新县），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，陈昌浩同志任分局常委兼团中央分局书记。并且宣布中央分局的职权“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”。就这样，鄂豫皖的党政军大权

就被张国焘一手独揽了。

张国焘先后把红四军中坚决反对王明“左”倾路线的领导、政委余笃山同志、军长旷继勋同志、政治部主任陈定候同志撤了职。又在分局扩大会议上围攻曾中生同志，强迫曾中生同志承认“错误”，并把早在苏联反对王明的特委委员徐朋人同志开除了党籍。张国焘就这样强行推行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路线，实行“转变”与“改造”。张国焘这些行为遭到了根据地广大党员、干部的抵制和斗争。

一九三一年夏天，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“围剿”。我红四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反“围剿”，在军长徐向前同志、政委曾中生同志的率领下从河南新集南下，八月首先攻下了英山县城，全歼守敌一个团，缴获枪支三千多条。接着又继续前进，攻克罗田、浠水、广济。在曹家河全歼敌新编第八旅，九月份又在洗马畈歼敌一千多人。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歼灭了敌人七个团，缴枪四千多支，俘虏敌官兵五千多人。我红四军前锋威逼黄梅、武穴，震动武汉、九江。然而正当我准备继续开展英山、蕲春、黄梅、广济等地的工作，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，以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红军反“围剿”斗争之际，部队却接到了中央分局张国焘命令北退的信。我红四军只好被迫放弃了有利战机，退回根据地。

九月五日，在英山县鸡鸣河军部召开支部书记、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，经大家讨论，认为南下以来取得了很大胜利，应继续利用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“围剿”还未到来之际，开展积极的斗争，而不宜北退。会后，曾中生同志又根据大家讨

论的意见，复信给张国焘陈述理由。然而张国焘丝毫听不进正确意见，一意孤行，命令红四军北退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红四军领导提出南下出击，积极向外发展时，张国焘就胆小怕事，害怕引火烧身，不愿意给中央苏区分担忧患，配合中央苏区的反“围剿”。他以“巩固苏区”为借口，污蔑南下出击的行动是“立三路线的残余”，“有引敌进攻根据地的危险”，经过大家一再坚持正确的主张，他才不得不同意向外发展。可是，在讨论南下进攻方向的时候，张国焘却一反常态变“右”为“左”，竟命令红四军一个月攻下英山、潜山、太湖，威逼安庆，震动南京。红四军领导同志认为，应在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，牵制敌人兵力达到援助中央苏区的目的，不应进攻中心城市安庆（安庆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）。可张国焘不听大家的意见，仍按其错误意见作出了决定。红四军南下后，经分析认为：主力通过四百多里白区打安庆，敌情、地形、群众基础远不如南下浠水、黄梅、广济，收复这片地区可和皖西、鄂东根据地连成一片。红四军领导同志把行动方向直接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。这时张国焘连给红四军发了四封信，指责改变攻打安庆的计划是“抗拒分局指示”，“是脱离后方无阵地的作战”，同中央分局是“原则上、路线上的分歧”等。曾中生同志在复信给张时，尖锐地指出了他的错误。他恼羞成怒，可手中又无真理可言，就用阴谋手段来陷害曾中生同志，寻机夺取红四军的领导权。

恰在这时，国民党特务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的名义，派

人送信给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同志，诡称许已与敌勾结，欢迎他投蒋，进行离间破坏。许继慎同志光明磊落，把来人逮捕，连信一同送交军部，红四军领导随即附上自己的意见送交中央分局。张国焘就利用这件事在新集非法逮捕了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、原红四军党委书记李荣桂等同志。制造了一个所谓许继慎同志等“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蒋”的“全盘反革命计划”和“反革命中心组织”的假案。九月，陈昌浩同志到红四军接替了曾中生同志的政委职务，紧接着就开始“肃反”，大肆抓人。红四军北退至河南光山县白雀园时，张国焘又亲自出马，主持“肃反”。当时，我正送一批参军青年到白雀园，见到大批红军干部被逮捕，一打听，说是“反革命集团”，是“AB团”，“第三党”。送青年参军的家属一再叮嘱他们可别入什么党、当干部，只要打白匪就行了。在那以后不久，就听说许继慎、周维炯、姜镜堂、熊受喧、魏孟贤同志等红军高级指挥员被张国焘杀害了。他们还给曾中生同志戴上“反抗中央分局”和“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”的帽子，污蔑红军犯了“政治路线上的错误”。中央分局又按照张国焘的调子作出了关于红四军问题的决议。

当时，对混入革命队伍的敌人“肃反”是必要的。但张国焘却利用“肃反”扩大打击面，把坚持正确路线，抵制错误路线，对敌斗争不畏艰险，创建根据地有功的老干部作主要对象，从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。张国焘在红四军“肃反”后，接着把“肃反”扩大到地方党团组织、政府机关和群众组织，采用逼供信的手段，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，把成批干部，群

众关进保卫局秘密杀害。张国焘还采用特务手段，强迫一些十五、六岁的勤务兵，为他侦察干部的言行。许多好同志一夜间就不知去向。曹学楷、戴克敏、徐朋人、王秀松、徐百川、陈定候、陈奇等同志，就是这样被他们杀害了。那时许多部队连以上的干部，地方区县的干部都这样被他杀害了。张国焘起了国民党反动派起不到的作用。

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土地革命问题上也贯彻了王明的“左”倾路线。本来《临时土地大纲》规定：“没收地主豪绅土地，分给贫雇农、失业工人和退伍士兵。对富农和小商人实行与地主有区别的政策。达到团结中间阶级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目的。”一九三〇年根据地就实行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。在这期间虽然受到立三“左”倾错误的影响，有些过火行为，但很快就得到了纠正。几百万农民打土豪，分田地轰轰烈烈地进行土地革命，取得了很大胜利。获得土地的人民踊跃参军，支援前线，青壮年农民几乎都参加了赤卫队等地方武装。对这些土地革命成果，张国焘一概否定。他在《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提纲》中攻击鄂豫皖根据地“土地革命的利益被地富窃去，贫雇农，工人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”。接着又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出“重新分配土地”的决议。中央分局也发布了《反富农问题通告》，在“重新分配土地”和“反富农”的运动中，推行“地主不分田，富农分坏田”，“平均分配一切土地，中农自动拿出土地平分”等一系列“左”倾政策，又把一些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，把富农错划为地主，搞乱了阶级阵线，侵犯了中农的利益，甚至搞到了贫农头上，造成了严重损失。在经济上，也实

行“左”的政策，打击了中小工商业者。政治上实行除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外的“一切斗争”的政策，把中间阶级也赶到敌人一边去了。

五、成立红四方面军与第三次反“围剿”

尽管张国焘干扰破坏，可鄂豫皖军民仍然十分忠于革命事业，坚持不懈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。

一九三一年十一月，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七里坪合编为红四方面军，共三万多人。总指挥为徐向前同志。这时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“围剿”也已开始。在徐向前同志的正确指挥下，十二月攻下黄安县城，全歼守敌五千余人。接着挥戈北上。一九三二年一月在豫南亚港地区击溃敌五个团，二月又围商城击溃援敌二千多人，不战收复商城。三月，东进至皖西苏家埠，浴血奋战了四十八天，消灭敌十九个团另两个警备旅，共三万余人。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。张国焘被第三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，而积极贯彻临时中央通过的《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》。一九三二年初，在鄂豫皖省委成立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“中国革命形势逐渐成熟”，要“准备向帝国主义国家战争”和“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”，还说“国民党只有七个主力师，中央苏区可以搞掉两个，鄂豫皖搞掉两个，剩下三个师还‘围剿’什么？”一月二十八日，上海沦陷。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。张国焘更加头脑发热。二月份，鄂豫皖省委通过的《政治决议案》说：“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，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